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 大后方历史 上下

◎ 主 编 周 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 大后方历史（上）

◎主 编 周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 周勇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29-11865-5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史料 IV. ①K26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0793号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KANGZHAN DAHOUFANG LISHI

周 勇 主编

责任编辑:刘向东 苟坤明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吴庆渝 陈 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73 字数:1128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865-5

定价:146.00元(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建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德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斯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重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全国抗战,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国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投降了。但是法国老

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周 勇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中国抗战大后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抗战大后方主要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表述,是作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第一次提出来的。源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对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表述。长期以来,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分为10个部分: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二、红军长征到陕北;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四、八载千戈仗延安;五、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六、窑洞大学育英才;七、自力更生奏凯歌;八、延安整风铸党魂;九、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十、转战陕北、夺取胜利。经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的建设,200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建成并开放,其基本陈列调整为6个部分:一、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二、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三、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四、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五、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六、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其中将延安定位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关键。据报道,这一陈列大纲和陈列方案,先后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充分论证、反复修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视察,做出重要指示。2006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批通过了陈列大纲和方案。(见2009年8月25日《延安日报》:《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 精心打造时代精品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延安革命史陈列布展纪实》)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这是中央对延安及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的新表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民族的宽广襟怀,使这一研究达到了新境界。这也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界的心声,故作上述表述。

一、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大后方”概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国爆发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逐渐呈现出分化的态势,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这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1938年10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的概念,他说:“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抗战时期的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①。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②。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战局时,再次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③。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都明确地把以西南西北为主的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称之为“大后方”,成为党内的共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大会正式设置“大后方代表团”,与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代表团一起,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出席了这次党的历史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9—600页。

^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8页。

^③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年3月),《周恩来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02页。

上的盛会。大后方代表团共84人,正式代表58人,候补代表26人。叶剑英担任大后方代表团主任(亦称团长),陈铁铮(即孔原)担任副主任^①。

中国共产党视野下的“大后方”,主体指西南西北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西康、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集合体,包含了地理、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

由此可见,“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只是阐述其内涵的时候,赋予其具体的含义。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环境

抗战时期,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都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民主的新中国。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而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核心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②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国共合作是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中心,团结抗战是两党的最高利益。这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在国共关系上的体现,而维系两党合作又是抗战胜利的基础。

但是国共之间除了抗日,在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共同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②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第2版。

点。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虽然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顽固坚持独裁,坚持“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摩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而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这就引出了许多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国共合作就不能持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可能瓦解。

面对这种危机,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便成为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吃过“左倾”路线的亏的。现在则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①。因此,总结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把这三者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个是党领导的大后方地下工作^②,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大后方工作的地位益显重要。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职责,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大后方实际上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因此,南方局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居于全局性的地位。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②宋平同志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第1—3页。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

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中共在大后方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这是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发挥的主要作用。“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①

经济上,尽管中共在大后方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建设,但在南方局专设有经济组,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经济资料,从经济的角度开展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厂矿内迁和新建,全国工商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南方局领导人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促成他们思想转变和政治进步,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构筑抗战胜利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中共在抗战大后方没有敌后战场那样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但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把游击战争置于战略高度予以部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游击武装,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和认可。从1939年2月起,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衡山连续开办了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出叶

^①胡乔木:《关于南方局党史的编写及其他》,1988年12月9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41页。

剑英等30多位干部担任教学等工作,周恩来“游干班”亲自讲课,培养了3000多游击干部,主要分配到南方各战区,领导游击战争。南方局军事组还为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改善双方关系,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出现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新高峰,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与中共南方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大后方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公开平台,团结和影响了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组织“雾季公演”,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增强了全国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对外交往上,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南方局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没有与派驻在中国战时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建立官方关系的权力,但是周恩来与他的同事们仍然与若干外交使团建立起灵活的工作机制。而周恩来本人则凭借着超凡的个人魅力、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重庆外交圈备受尊敬的人物。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的形势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秉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促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成为西方世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冰之旅;促成了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序幕,这“是中共与西方关系中的历史性里程碑”^①;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签订《延安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罗斯福通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组国民政府,

^①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姿态进入国际外交视野，也是重庆时期的一大发展”，“推动中共在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大后方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克服矛盾、相忍为国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抗战时期维护和争取国家、民族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沦陷区人民保留了一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曙光到来的希望，坚持抗战到底不动摇，维护了中国独立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战时国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抗战从开始的同情到支持，最后走向全面结盟。

在精神上，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大后方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体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重庆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直面强敌的坚定、从容、坚韧和勇气，体现了“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那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和伟大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四、研究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旨在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卓越地位和巨大作用,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历程和宝贵经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大政党。虽然他们的政治纲领、政治信仰存在重大差异,但却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民族振兴、国家进步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大后方合作抗战的历史,通过各地保存资料的参照对比、梳理考证和重新解读,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真实;系统论证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总结梳理抗战结束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造成的严重伤害,进而充分认识国共两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的经验教训,强化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化解两岸歧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